

掌门人笔下的体坛秘闻

■本报记者 孙磊 整理



邓亚萍能有今天要感谢很多人,特别是袁伟民。

作为中国曾经的“体坛掌门人”,袁伟民掌握了体育界众多鲜为人知的幕后新闻,在新书中,这样的故事层出不穷。

不能因为钱,让邓亚萍留学受阻

随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,袁伟民非常重视中国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新老交替工作。他特别希望不断有人能够加入到国际体育事业中去,为中国争取更多的话语权。为此,他舍得挤出经费、挤出时间为有潜力的同志创造学习条件和学习机会。他说“不要认为这么做会摆不平,以后,凡是运动员去国外留学的,谁能念到博士我都支持!”

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,曾经入选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,袁伟民支持她去英国学习。可邓亚萍的学费问题却真是费了一番波折。“当时为了学费的问题我找他们(指体育总局和乒羽

中心)谈话,他们有的人不太支持,因为邓亚萍这个人个性很强,有时候说话有点冲,很聪明也很精,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她的个性。”

在邓亚萍去英国留学的问题上,最初,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是想提供支持的,但袁伟民坚决不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接受“外援”。

“1997年上海第八届全运会的时候,萨马兰奇来参加了,我们请他吃饭,当时分管体育的国务院领导也在场。说到邓亚萍上学,领导也说:‘很好,我们保证她,我们负担她的留学费用。’但是此事却迟迟没有落实。最后邓亚萍告诉袁伟民说,萨马兰奇说了:‘你们不能解决,我帮你解决。’我一听,这不把中国的脸丢光了?……我找杨树安,当时杨树安是他们中心主任呀。我说杨树安,这样的人物乒乓球队能有几个?你们不培养培养她?现在听说钱很紧张,你是不是真想让我出这个钱?连萨马兰奇也看出了邓亚萍是

“5·19”后,和被拘球迷面对面

1985年5月19日,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以1:2输给香港队,痛失世界杯出线权。赛后,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“足球骚乱”。工人体育场外,愤怒的球迷投掷石块、砸毁车辆、打外国人、烧东西,并且和警察发生了冲突。龙潭湖边中国足球队的驻地,聚集起很多愤怒的球迷,他们要见球员、见教练,更要见国家体委的领导。

几百个球迷给袁伟民写信,有的要求他“救救足球”,有的提出让他当足球教练,有的说这一天是“国耻日”。信中说:“看了那场比赛,泪水一滴一滴掉下来,我为泱泱大国的足球不争气羞愧万分”;“现实的结果一次又一次叫我们失望,把我们最后一点自尊心也输掉了”;“国家体委的确要下决心抓抓足球、抓抓教练了”。

袁伟民为此对《体育报》记者发表谈话说:“这场比赛既输了球,也输了人,由于赛前过高估计自己并对困难准备不够,临场战术运用不当,打得急躁,致使又一次失去了‘冲出亚洲’的机会。这里反映出我们的工作不深入、不细致,我们领导应该首先承担责任。”

球迷骚乱后,公安部门拘留了一百多名肇事者,根据当时的有关规定,这种拘留不能超过15天,超过15天就要移交检察机关走正规的司法程序。到第12天,有关部门决定释放大部分情节较轻的人。

北京市委领导建议袁伟民去和这些球迷谈话,对他们晓之以理。

5月30日下午,袁伟民带着郎平、李宁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第六看台。袁伟民回忆道:“闹事的人都坐在那里,每几个人中间有一名公安人员,我去跟他们谈,与他们沟通,在他们承认错误以后就把这些人放了。”

给闹事球迷讲话的时候,袁伟民拿出一份他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时留下的剪报,他说:“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吴家玮是位华人,他被聘为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顾问,他在当地华文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,标题是《赢输也是我们的宝》。”

袁伟民引用吴家玮的观点说:“我们要有‘不管赢了、输了,我们都是一家人的心情,不能有那种‘赢了球是我

们赢了,输了球是他们输的’的想法。打过球的人都知道:赢了球不需要您老人家捧,输了球才需要鼓舞。总之,赢了,他们是我们的宝;输了,他们也是我们的宝!”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

足协主席人选的小插曲

足球,也许是留在袁伟民半个世纪体育生涯中最“心痛”的一页。

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台下,聊起如何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,袁伟民都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:首要问题是体制与班子。

袁伟民认为,当前在中国,要把足球运动搞上去,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监管,无论怎样深化体制改革,这条都不能丢、不能没。否则已出现的问题和今后还会遇到或出现的问题,不可能得到综合治理。必须有复合型的人才组成强有力的足协领导班子。

袁伟民曾经想让李富荣去担任有职有权的足协主席。他对李富荣说:“你去当那个管理中心的头儿,但还是总局党组成员,待遇不变,还是副部级。”为此,袁伟民还专门向上级组织部门请示过。

“为什么我想这个办法呢?我想我不可能把我的精力重点放在那儿,我知道要搞这个足球不是说一般抓抓就行,非得全身心投入进去,就是这样也不见得马上见效。我当时想的是:去专管足球的这个人,行政级别要高一点,得懂竞技体育,而且要有影响力、知名度,李富荣在竞技体育方面比其他的人强,经历在那儿摆着,这样说话才有人听。”袁伟民说。

几天之后,李富荣跟我说,他不去了!他说:“我搞乒乓球这么久,最后搞足球,弄得不好……”

袁伟民还想让汪洋到体育总局管足球。

“1992年,第二次让我当足协主席的时候,我曾想请汪洋来当足协的专职主席——那是他在安徽铜陵当市长之后。我给安徽省委书记打电话,你说你调他可以,但他是后备梯队人员,你们把他提起来,我们就放。我说马上提起来我没那个权力,现在想想要是把汪洋调来还真不是限制住他发展了——他曾是全国省市中 youngest 的体委主任。”

阿胶之初刻拍案惊奇之五十八

似水柔之阿胶抚慰你的无名肝火

文 / 钟闻

唐太宗皇帝之所以能够开创一个辉煌的大唐盛世,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礼贤下士,广纳良言。

唐贞观17年,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书论时政得失,太宗皇帝龙颜大悦,赏赐钟乳一剂,嘉奖道:“卿进药石之言,朕以药石相报。”

太宗皇帝意思是,良言有如良药,臣子为皇上进了有益国家的良言,皇上回报给他有益身体的良药。

收到良言回赠良药的举动也说明,唐太宗非常重视滋补养生。这就让我们不难理解,为了获得真阿胶,唐太宗居然不惜动用皇家权威,派遣尉迟大将军“官封”阿井,以保纯正阿井水专为贡品阿胶使用。

那么,真阿胶有何神力,值得堂堂的太宗皇帝如此兴师动众?

关于阿胶,实际上有一个漫长的认知过程,自汉至今,总有新的发现。不过对阿胶研究、解析集大成者,还要首推明朝李时珍,其研究结论最为权威。如果说,在李时珍之前,历代医家基本各执一端,那么在此以后,后世医家更多只能在李时珍研究基础上进行补充发挥了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是中国药物学的开山之作,全书载药365种,按药物功效的不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品。上品120种,功能滋补强壮,延年益

寿,无毒或毒性很弱,可以久服。中品120种,功能治病补虚,兼而有之,有毒或无毒,当斟酌使用。下品125种,专祛寒热,破积聚,治病攻邪,多具毒性,不可久服。

阿胶被列为“本经上品”,据载久服可“轻身益气”——这在中国药典里是关于药效的至高评价之一。

“轻身益气”似乎有些抽象,《神农本草经》对此更具体的描述则是:主治“心腹内崩,劳极洒洒,如疟状,腰腹痛,四肢酸痛,女子下血,安胎。”

对现代人来说,这些古色古香的语录大概如同天书。所谓与时俱进,对阿胶,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理解,而这种理解照例就会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时尚。正如今天,多数人认为阿胶是补血圣药一样,虽然不乏偏颇,却也自有如此立论的道理。

唐代名医陈藏器认为:“诸胶皆主风、止泻、补虚,而驴皮胶主风为最。”这个说法作为当时的主流认识,自然也左右了唐代的阿胶消费心理。

大家都知道,驴这家伙,一双大眼睛看似天真无邪,实际不是好对付的,性如烈火,倔起来无人收拾得住。正所谓一物降一物,那驴皮经东阿地下水轻柔浸润,居然脱胎换骨,扫尽刁蛮,踏踏实实担当起了“主风、止泻、补

虚”的职责,并且胜任有余。

“风邪”者,从中风口噤失语,热风瘫痪麻痹,到产后风虚,风牙肿痛,落枕硬脖子,腰腿痛,都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常见症候。按陈藏器的说法,阿胶对这些麻烦绝不推辞,照单全收,不畏劳苦,倾心竭力。

唐太宗早年率众南征北战,出生入死,风霜雨雪,想必本人与开国功臣们身体也都落下了大小毛病,起码“风症”是少不了的。唐太宗垄断阿胶,除自己享用还分赐文臣武将,也是意味深长了。

因为《黄帝内经》上说,“诸掉风悬,皆属于肝”,战争尽管结束,但朝堂之上,又是文武群臣争权夺利的厮杀之地,整日争斗不断,怎能不个个虚火升腾,中风几率大增?李时珍还明示,阿胶单方可治瘫痪偏风以及老人便秘,此说更合乎太宗皇帝朝廷的需求。

难得阿胶慈悲为怀,为英雄豪杰沉降燥气,清除其满肚子有名或无名的肝火,使他们就像驴皮被东阿县之水调理的一样,变得任劳任怨,平心静气。

最近有些烦吗?让温和的阿胶帮你调理调理吧。

故事结尾,我们重温药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的名言:“阿胶本经上品,弘景曰:‘出东阿,故名阿胶’”,寻觅民族瑰宝,知其源头出处。